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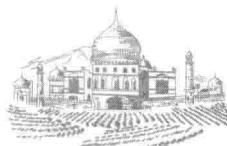
Xifang Wenhua Gailun

西方文化概论

谭炯玲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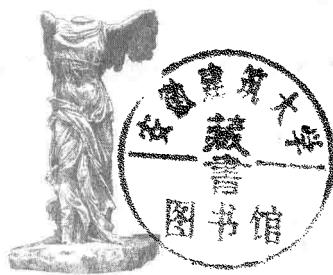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Nifang Wenhua Gailun

西方文化概论

谭炯玲 编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文化概论/谭炯玲编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 - 7 - 5623 - 5579 - 3

I. ①西… II. ①谭… III. ①西方文化 - 文化史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K500.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5806 号

西方文化概论

谭炯玲 编著

出版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l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 林起提

印 刷 者: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306 千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文化概述	1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起源	1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4
第三节 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	7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文化	20
第一节 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20
第二节 古希腊文化	29
第三节 古罗马文化	35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41
第一节 基督教	41
第二节 中世纪基督教与西欧封建社会	58
第四章 西方近代文化	70
第一节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70
第二节 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	90
第三节 近代哲学思想	105
第五章 西方现代文化	111
第一节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111
第二节 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	115
第三节 现代西方哲学	118

第六章 西方艺术概述	124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艺术	124
第二节 中世纪教堂与雕刻艺术	128
第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132
第四节 巴洛克艺术	139
第五节 古典音乐	147
第六节 现代音乐、舞蹈、电影	151
第七章 西方文学概述	158
第一节 古希腊文学	158
第二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161
第三节 西方近代文学	165
第四节 现代文学	176
参考文献	182

第一章 西方文化概述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起源

欧洲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期，在德国海德堡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是欧洲发现的最早的晚期猿人化石。这说明距今180万年到30万年，欧洲已经有人类存在。1856年在德国杜塞多尔夫城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属早期智人，也称为古人，其生存年代距今30万年到5万年。生活于5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化石在欧洲也有发现，1968年在法国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化石就是其代表。考古研究的发现证明，欧洲与非洲、亚洲一样，是古人类长期居住的地区，具有连续性的文明传统。

欧洲的先民们创造了自己的史前文化。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曾把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列表如下：

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前期：

舍利文化期（Chellean）

阿舍文化期（Acheulean）

旧石器时代中期：

莫斯文化期（Mousterian）

旧石器时代后期：

奥瑞聂文化期（Aurignacian）

梭鲁特文化期（Solutrean）

马格德林文化期（Magdalenian）

新旧两石器时代过渡期：

阿奇文化期（Azilian）^①

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农业文明产生，人类开始社会生活的新纪元。

公元前2万年（一说为公元前1.2万年）前后，也就是从旧石器时代后期的细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之际，古人类从采集与渔猎的文明进入农业文明。考古学称之为“新石器革命”。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说过：“文明是由‘野蛮’的新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现今考古学文献中，多使用‘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一名词来指人类发明农业和畜牧业而控制了食物的生产这一过程。经过了这个‘革命’，人类不再像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的人那样，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靠天吃饭，这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一次大跃进，为后来的

^① 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之艺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页。

文明诞生创造了条件。”^① 这是对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意义的准确概括，欧洲大陆上的古代文明就起源于这一历史时期。

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众多的民族来到爱琴海地区。爱琴海只是地中海的一个小海区，具有地中海的自然与气候特征。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一般以山地为主，粮食与其他农作物不多，只有葡萄和橄榄等作物比较适合生长。但由于这一地区的海岸线绵长，岛屿密布，有相当好的深水良港，有利于海上航行，所以希腊人自古就善于航海。爱琴海地区与尼罗河、印度河、黄河、两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区别较大，人们的生活风俗也不一样。总体来看，这一地区发展农业与畜牧业并没有太大优势，但有利于经商与航海，大规模的工商业贸易起源较早。

古代民族主要从两个方向聚集到这里。首先来到希腊半岛的是亚细亚民族，包括皮拉斯吉人、勒勒古人、卡里亚人等。从人种来说，他们是地中海人种与其他亚洲种族，其中地中海人种的民族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在北非、西亚地区生活。另一个方向是来自北方，他们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被称为“赫伦人”。公元前3000年后期，这些人来到了希腊的中南部，与当地人融合，成为希腊人的主体，随后他们之中的阿开亚人在希腊半岛上创造了迈锡尼文明。除此之外，还有爱奥尼亚人、伊奥利亚人、马其顿人等。这些民族在以后的希腊文化创意中，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最早产生的是爱琴文明，这是希腊罗马文明的前奏。爱琴文明产生于爱琴海地区，它主要包括两个分支，一个是克里特文明（公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另一个是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这两种文明都是奴隶制国家。②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文明因多利亚人的入侵灭亡，希腊地区进入荷马时代。这一时期希腊社会从奴隶制度向氏族社会倒退。③希腊以奴隶社会为主的城邦制度形成，进入古希腊城邦时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文明开始衰落。希腊人的近邻马其顿人兴起，希腊受马其顿人统治。④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征服马其顿，受马其顿统治的希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终于落下了帷幕，从此，欧洲进入封建社会。如果从希腊城邦时代算起，希腊罗马文明大约有1300年的历史，西方一般把希腊罗马文明称为“古典时代”。

新石器时代后期，克里特文明产生。这一文明始于一种被称为米诺斯的文化，最终形成于克里特岛上，至少于公元前3000年就已存在。克里特岛是爱琴海的岛屿群中最大的岛，总面积有8600多平方千米，地扼爱琴海向地中海的出口，是亚、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道。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绘它时说“美丽富饶，在它的九十座城镇中，最大的就是米诺斯”。这说明米诺斯当时已经是克里特地区的文化中心。1900年，著名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在克里特岛米诺斯宫发现了古代文字，人们称之为“米诺文字”。这是一种陶器文字。米诺斯第一宫修建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0世纪，毁于公元前14世纪，这就意味着，米诺文字是公元前14世纪之前的文字。《荷马史诗》通过口头流传，证明当时希腊还没有文字。那么克里特岛的文字可能是古代希腊文的前身。这证明古代希腊人可能独立创造过文字，之后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有人推测是异族入侵，才改用腓尼基字母。人们关注古希腊文字存在与否

^① 夏鼐. 考古学论文集（下）[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页。

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克里特文明是爱琴海地区最早的文明，经过对该地文明遗址的发掘，人们发现它曾经有过建筑精美的宫殿、工艺精良的手工艺品，而且发现了线形文字泥版文书。这就证明克里特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克里特人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民族之一，他们首创了爱琴海地区的航运业，扬帆希腊半岛，甚至远航埃及，运去本地出产的精美工艺品，以交换粮食等。这一地区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进入青铜文明时代，与中国的青铜时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青铜时代相近，但发达程度并不完全一致。克里特的农业与种植业也比较发达，农产品中包括谷物、葡萄与橄榄油等。克里特文明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宗教信仰以自然神与生殖崇拜为主。岛上的城邦中，以克诺索斯城邦最为强大。考古发掘表明，克诺索斯王宫的建筑宏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宫中用具讲究，象牙、陶品与青铜器制作精美，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展现了古代爱琴海人民较高的金属工艺水平。

这种文明后来被来自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文明所取代。迈锡尼文明产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它的形态是一种早期城邦文明。迈锡尼是古代世界的一个军事强国，曾经与埃及人等异族进行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战争当数他们攻打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邦，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经过长期的战争，以迈锡尼人为首的希腊联军终于攻克特洛伊城。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就是以特洛伊战争为题材的，诗中讴歌了希腊的英雄，同时也对特洛伊人的英勇不屈表示赞赏。从史诗中，可以看出古代希腊人的性格与心理特征。

迈锡尼出土文物中，青铜武器、工艺品制作精美，工艺考究，其工艺水平已经超过了克里特人。迈锡尼人发明了一种文字，书写于泥版之上，称为线形文字B，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这种文字经过英国考古学家文特里斯与柴德威克的艰苦探索，已经可以被解读。

就在特洛伊战争后不到一个世纪，多利亚人入侵迈锡尼。多利亚人是一个文明程度相对较低的民族，他们征服迈锡尼之后，恢复了氏族制度。《荷马史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属于这一时期，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荷马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人从氏族社会向全面的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私有财产已经十分普遍，阶级分化严重。估计在荷马时代后期，奴隶制已经出现，氏族首领成为大奴隶主，奴隶属于奴隶主所有。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战俘分配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中奴隶的主要来源及生活状况。希腊地区的农业在这时得到较大发展，铁制农具逐渐取代青铜农具，人们开始使用铁制的武器，这都是迈锡尼人所不具有的。荷马时代的农业耕作中还使用了双牛牵引犁、铲、鹤嘴锄、镰刀等农具，手工业的工艺虽然可能不如迈锡尼时期精美，但仍然相当发达。

荷马时代的社会形态是氏族与部落为主的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军事民主制，由各部落与氏族首领组成联盟，设立议事会、人民大会与军事首领三大机构进行社会管理。由部落首领们组成的议事会是常设的管理机构。人民大会决定重大事宜，是最高权力机构，对重要决议采取表决制度。军事首领一般就是部落首领，通过选举产生。在战争年代，军事首领担任指挥工作，平时还要主持诉讼等方面的行政事务。这种制度是荷马时代的一个重要贡献，它对于希腊人的民主制度有深远影响。

第二节 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然后再根据已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从而使各门科学技术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

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和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因此，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如前所述，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同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

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自由、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古希腊的民主传统，可以说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

启蒙主义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时候，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思想，那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利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致。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影响的。

三是法制精神。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利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

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整个西方文化之中。

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笔者认为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述，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

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另一方面，也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

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

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

第三节 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

一、西方古典文明的东方观

(一) 东方观的滥觞

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希腊地处地中海。地中海向西就是浩瀚的大西洋，受到航海技术限制，古代希腊人还不能在大西洋进行远航。因此，希腊人自称为西方人，将亚洲的波斯人等称为东方人。

希腊水手在地中海航行，称西侧的陆地为欧罗巴，东侧的陆地为亚细亚，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以后世界两大洲的分界。东方为亚细亚，就是以后的亚洲；西方为欧罗巴，就是以后的欧洲。至于为何如此命名，人们争论不休。其中一种说法是，亚细亚是爱琴海太阳升起一侧的名称，而欧罗巴则是爱琴海太阳落下一侧的名称。也有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亚细亚与欧罗巴都是古代神话中女性的姓名，以后被用于代表两大洲。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大洲的名称来自古代希腊。在东西方相互认识的过程中，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以色列人接触较早，而远东其他民族较晚才被认识。

古代西方对东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不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认识中，希腊人曾经把位于北非的埃及看作东方的主要国家，并且以埃及为东方文明的代表。埃及文明早于希腊，而且埃及、利比亚都曾与希腊有过频繁的文化交往，这些地区相对于希腊，地理位置都偏向东方，所以希腊人将他们看成是东方人。这时的希腊人对发达的埃及文明还是羡慕的，对东方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基本肯定的。第二阶段是雅典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前后。这时古代希腊文明达到较高程度，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世界整体性认识的萌芽。发生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使希腊人对东方产生截然不同的异己文明的印象，东西方二元化的立场开始形成。从希罗多德开始，分别位于欧洲与亚洲的希腊与波斯成为西方与东方的代表，这时希腊人对于东方文明的态度十分矛盾，睥睨与恐惧、神秘与好奇等多种复杂心理同时具有，对于东方的社会制度、经济与物产、人民生活方式等有许多猜想。

真正区分东方不同地区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是对西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希罗多德首次明确了远东与近东的概念，东方，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有远东与近东之分。当时他并不知道有中国，但是已经指出波斯距离希腊较近，另外还有“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

公元前6世纪，雅利安人已经将领地向南推进，印度已经是经济文化繁荣的文明古国之一，并不比希腊落后。另外，这时的希腊人已经知道赛里斯人等其他东方民族，并且将赛里斯人看成是世界最东方的民族之一。关于这一时期希腊人的看法，可靠的资料并不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希腊人克泰夏斯关于赛里斯人与印度人的记载：

赛里斯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cubits），寿逾二百岁。格忒罗斯河（Gaitros）畔某处有人，其形类兽，皮与河马相似，故弓箭不能入。^①

^①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9页。

克泰夏斯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中国周代。这种记载具有神话性质，如同中国《山海经》中所述海外诸国一样，估计是古代民族之间直接或间接接触中所传达的异域消息。

(二) 东西方的早期接触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成为西方重新认识东方新阶段的开始，亚历山大的大军征服了波斯、小亚细亚、北非，直到印度。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入印度河流域，因为气候炎热与瘟疫流行，才没有继续前进。亚历山大建立的大帝国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使得东西方国家之间第一次实现了全面的交流。以后，东西方的交流进一步扩大，地中海民族对于东方的国家与民族有了新的认识。经过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后来全球海上航线的开通，无论是对于近东还是远东国家，西方人都有了更为深入与切实的看法。

中国人与希腊人一样，从最初的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逐渐向“万国世界”的认识转化。根据中国历史学家的看法，史书所载“黄帝登昆仑”，表明中华民族的先祖已经到达西域各国。而当时的西北地区活动着多种民族，这些民族后来在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的威胁下，陆续西迁，离开了西域，进入欧洲与西亚，有的成为西方古代民族。中国在汉代时已经完全清楚西方罗马的存在，《史记·大宛列传》与《后汉书》中关于大秦与其他罗马别名的记载，说明中国人当时已经知道，在世界的西方有一个发达的文明国家，那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有健全的国家制度，“置三十六将，皆议国事”，甚至提到了他们的市场交易规则。中国人隐约意识到，这个远方的国家不同于当时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而是一个与中国的文明程度相近的国家。当时的局势是，大汉帝国与罗马帝国都在努力寻找到达对方的通路，但是居于两大文明与两个大陆中间的安息国阻断了这种联系，使得两大文明不能全面接触。

161年，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留斯·安东尼派出使者到东方。162—165年间，罗马征服了帕提亚人，解除了古代罗马的重要威胁之一。166年罗马使团到达中国，这一年是东汉延熹九年，这是罗马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使团，也是地中海文化的使者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在东西方交流中，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一方面是传教士、教士、教民与各种各样的学者，他们来往于东西方国家之间，进行传教、朝圣等活动与学习交流；另一方面则是商业交往，东西方之间的大量货物与产品交易繁荣，热闹非凡。东西方这个时期交往的通道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

二、西方对东方的看法

(一) 中世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改变了对东方原有的认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原本是专制而强大的波斯与富饶文明的中国、印度，现在东方却成为落后愚昧的国度。与东方的交流开始变成对东方的掠夺和以传播宗教的名义进行的文明征服。在西方人眼中，文明差异变成了文明的等级高低不同，西方文明成为高级的文明，其他文明则被认为是低级的，“罗马之外全部是蛮族”的思想成为主流观念，并且在以后的各个世纪中越演越烈，直到现代社会的到来。

10世纪开始，西方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与此同时，西欧的城市化也随之产生。到16世纪之后，西欧工商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形成，新的国家政治制度初现雏形，新兴的人文主义与科学技术进一步丰富了西方文化。经过产业革命，西方在世界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领先于世

界。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原因，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才出现了不对等。

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几经反复，曾经兴旺发达的商业贸易一度几乎中断。陆路交通上，受到阿拉伯帝国兴起的影响，经常处于交通隔绝的状态。只有在蒙古帝国打通欧亚大交通的时代，才建立起短暂的联系，但是好景不长，随着蒙古大帝国的崩溃，东西方交通再次基本断绝。其原因在于，从西亚到中亚这一咽喉地带再次被奥斯曼帝国所垄断，使得商人们望而却步，于是漫漫丝绸古道，驼铃声稀，商贾冷落。虽然不像有的学者断言的丝绸之路已经断绝，但它们已经远非当年的兴盛景象。

中西文化交往中的一段插曲经常被人们提到，那就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于13世纪进入中国。当时由于蒙古人的征伐，东西方交通处于战争状态下，相互隔绝的时间很长，有的西方人已经对远东与中国感到完全陌生。所以当《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版时，竟然被视为奇书，书中记述了一个当时不为多数欧洲人所知的中国文明。绝大多数人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比欧洲还发达的东方文明是不可想象的。从对这本书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真是非常少。

中世纪东西方交往中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与现象，从这些事件与现象中，可以看到世界主要文明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历史时期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古老的东方文明仍然在继续对西方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欧洲人对于东方产生了不同看法，有了新的东方观念。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这一时期西传欧洲，成为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大事件。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与造纸术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传入欧洲之后，推动欧洲航海、军事、经济与科学飞跃发展。近代西方科学的先驱、英国思想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指出，这些发明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发明，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明代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中西方关系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他进入中国后，还不承认西方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他曾经比较过中国的印刷术与西方的印刷术：

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但与西方的有所不同。中国字的数目极多，不能用西方的方法，不过现在也采用一种拼凑法。……至于论速度，我觉得西方印刷工人排版与校对一张所用的时间，与中国工人刻一块版所用的时间不相上下，也许中国工人所用的时间还少一点。^①

但也有相当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承认，中国的这些发明使世界受惠。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使得哥伦布能够完成环球航行，开辟世界海上航线。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使西方能够制造枪炮。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术与造纸术是近代文明推广的主要工具。

（二）早期传教士的活动

向东方传教是从基督教诞生之后就开始的事业，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耶稣教，无一不把东方看作最重要的地区。西方向东方派出传教士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其中派出人员最多的是在17世纪之后。中世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中，最有影响的是景教传教士，其传教活动颇具传奇性，成为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段很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传教士的活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传教士们的活动把东方国家的状况向本国反映，这为西方了解东方开辟了一条途径。绝大多数西方人包括官方都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东方的，所以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传教士的书信、日记、著作与杂记等都成为最重要的文

^① [意大利] 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刘俊余、王玉川译，台北：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8页。

件。这就产生了一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传教士们毕竟是从宗教活动角度来看待东方事物的，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都有许多偏见，这种偏见传入了西方世界，左右了西方人的看法。

海上交通航线开通之前，来到东方的传教士中称职者其实屈指可数。这一时期，意大利人在东方探索中居于重要地位，因为意大利是欧洲工商业文明发展的前锋，而意大利工商业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东方的贸易，来自东方的香料、丝绸、染料等产品是意大利贸易的主要货物。同时，意大利在欧洲宗教中所处的特殊地位（罗马教廷就在意大利的领土之上），也是它首先派出大批传教士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与远东的交往中，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是意大利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Garpin），史称“第一位东方传教士”。他受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于1245年出发来中国，主要任务是说服蒙古人信仰基督教，与欧洲十字军夹攻穆斯林军队。众所周知，蒙古人与欧洲教皇之间的交往曾经引起世界关注，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宗教关系。因为唐代之后，欧洲人望向东方的目光已经不再紧盯着中国了，而是转向突然崛起的穆斯林国家。信奉实用主义的基督教徒要对抗伊斯兰大帝国，从战略上拉拢蒙古人是至关重要的。当年游牧民族匈奴人进入欧洲，致使罗马帝国灭亡的历史给欧洲以深刻教训，所以发展蒙古人信仰基督教成为教皇的重要任务。可是这位传教士似乎是位饱学之士，他最感兴趣的不是蒙古人的政治动向，反倒是中国文明。第二位著名的传教士是方济各会的约翰·孟加维诺（Jean de Monte Corvino），他于1289年前后来中国，在当时的元大都传教，后来由于功业不俗，受到教皇的奖赏，可见当时他是来中国传教士中相当杰出的人物。第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是方济各会的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他与孟加维诺是同一时代的人，继孟加维诺之后来到中国。鄂多立克善于观察，好学深思，但不擅长著述，他的名著《鄂多立克游记》据说是别人根据他的口述写下的。这本游记与马可·波罗的游记相比，虽然不如后者那样广为人知，但是很受历史学家们欣赏，因为其中提供的历史资料更为可信。

鄂多立克于1322年到1328年在中国传教，1331年回到意大利后去世。他东行的路线是从中东到波斯湾入海，在印度两海岸的塔纳登陆，经斯里兰卡到南洋，在游历了南洋诸岛之后，经越南到广州。在中国境内，他先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泉州，然后北上到达杭州与南京，经扬州到元大都，在这里居住了大约两年，然后到达山西与西藏，后经过中亚地区与波斯，回到意大利。这一路线完全是根据他的书中记载来确定的。如果认真考察，其中当然有相当多的可疑之处，如从西藏到中亚的道路当时没有开通，西方人到西藏的可能性不大。

鄂多立克游记中涉及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与同时期及其后的阿拉伯人的游记相比，记述内容广泛，见解深刻，有独到之处。他认为东方国家宗教是多样的，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的宗教、偶像教等在这里可以并存，其中对元朝的多种宗教有详细的记载。

关于中国的记载中的一些资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比如有关于景教在中国传播的记载。这是一条重要史实。《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35节说到扬州城中有“聂斯脱里派的教堂”，以后的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记录是可靠的。来到汗八里城后，描述这里的庄严宏伟的宫殿与王宫礼仪也很精确，但关于国家的行政划分只做了最简略的记载：

这个帝国被其君主划分为十二部分；每部分叫作一个省（singo）。这十二个部分中，蛮子那部分构成一个省，下属两千大城。并且，确实地，他的那个帝国是那样大，如有人想逐个访问这些省，那他要足足花上六个月的时间；而这尚不把为数五千的岛屿算在内。它们不

包括在十二个省中。(再者，有四名大臣管治这位大君王的帝国。)①

作者关于中国社会行政管理机构的观察显然十分粗略，记载也不够详细。

在鄂多立克之前，《海屯行纪》(原名《行纪》)是中世纪最早的东方游记之一。作者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他于1254—1255年间来到中亚地区与中国北方，先是晋见拔都及其子，然后再拜见蒙古王。如果此行果真如作者所言，那么他们的行程穿越中亚与中国，是中世纪极为重要的东方行纪。这本书受到地理学家们的极大重视，书中的路线及所记载的地名对于研究变化多端的中亚古代地理极为重要。但是相比之下，这本书中对于东方世界的了解实属不多，其中有相当多的怪诞神奇的描写，如描写沿途所见的蛮族时说，在契丹那边有个国家，其中女人是人形，天赋理智，而男人却是狗形，缺乏理智，大而有毛等。这种记载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神话，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山海经》。中国的《山海经》是与古代希腊神话同时代的传说，这种游记却写于13世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西方对于遥远的东方是多么缺乏了解。其中有的记载至今已经完全不可考证，如在准噶尔沙漠中，作者遇到了野人，他们是哑的，“还有黄黑色的野马，黑白色的骡子，大过马驴；还有双峰野驼”②。关于野人，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有过零散的记录，但流行不广。而有人推测，作者所见到的野马可能就是著名的普氏野马。关于双峰野骆驼，已经被当代生物学家们所证实，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有野生双峰驼，其中一个国家就是中国。

(三) 东方探险的终结：中国的发现

海上大交通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葡萄牙与西班牙于15—16世纪所进行的海上探险，分为两条航线。一条是绕过非洲南端到印度洋的航线，由于这条线路经过非洲海路，这就使得殖民主义者进入非洲成为必然。另一条航线则是穿过大西洋，经麦哲伦海峡，来到太平洋，发现新大陆美洲，殖民主义从此进入美洲。两条路线的探险分别以葡萄牙与西班牙为主。第二阶段是17世纪欧洲列强对北极、大洋洲等地的探险。前后经历200多年，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都被一一发现，这也使得殖民活动遍及全球，世界文明体系得以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条航线最终汇聚于南中国海。1509年，中葡两国商人在马六甲海峡初次会面，1513年葡萄牙人先来到了宁波海岸，然后转向珠江三角洲定居。1565年前后，定居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来到中国福建海岸，开始定居。其后不久，英国等列强也进入南中国海，这就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中心、海上交通的终结点。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与商人们最先大批来到远东，见到了传闻已久的东方丝绸之国，这打破了以往只有少数冒险家与敢于冒险的传教士才能踏上中国与日本土地的局面，其后到远东成为欧洲的时尚，各国纷纷组织传教士们进入东方。也就在这一时期，欧洲的耶稣会成立，耶稣会是基督教中新派组织，文艺复兴之后在欧洲成立，它的成立是基督教近代发展的结果。耶稣会的指导思想与传统教会有相当大的不同，重视宗教理性，宣传文明与进步。耶稣会教士中有不少立志于科学的研究的学者，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不但传播宗教，而且带来了欧洲的科学与学术。由于耶稣会教士素质较高，能够将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并且采取所谓“合儒”的方针，改变了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传教士不能深入中国社会的局面，

① 《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使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有了大的进展。耶稣会大批传教士远行东亚，进行深入考察，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便将中国社会状况以书信形式向国内报告，他们回国后几乎人人著书立说，使东亚社会的真实状况被欧洲所知。

葡萄牙第一位派驻中国的使节托梅·皮雷斯（Toméi Pires）的《东方概要》于1515年前后在马六甲等地写成，其中关于中国的记载是欧洲人当时的东方印象之一，他写道：

中国皇帝不信教，他（拥有）大量土地和人口。中国人是白人，和我们的皮肤颜色一样。大部分人穿黑棉布做的袍子，跟我们的差不多，只是很长。冬天腿上套上像短袜一样的毡子，脚穿制作精细的短靴，身着羊皮和其他皮毛的衣服。……中国皇帝不是父子相传，也不传给侄子，而是由常驻北京的国王委员会进行选举，并经大臣们通过产生。^①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早期葡萄牙人关于中国的记载是初步的印象，其中关于生活风俗方面的内容大多是符合实际的，但关于社会政治方面的见解有不可靠的地方。原因可能在于作者未能来到中国封建统治的中心北京等地，只是在南海一带活动。不过类似这样的记载在西方相当多，流行一时，引起了民众对东方的兴趣，也推动了欧洲与中国的交往。

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是16世纪对东西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传教士之一，也是最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本人是一位虔诚的教士，也是杰出的学者，1582年来华。他在中国期间认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成为传教士中第一位真正的中国通。在此之前，西方传教士研究学习中国文化者固然相当多，但是西方国家大多数使用拼音文字，表意文字的汉字对于他们来说相当难学。来中国传教士中，能熟练讲汉语、用汉字书写者并不太多。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与它的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直接的联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与西方相异，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能了解这一文化传统的传教士很少。同时，多数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并不了解中国现实，不懂中国的儒释道思想，直接将西方基督教教义向中国人灌输，结果无不遭到惨败。利玛窦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知道，要想教化中国人，必须先学好中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中国的文化，让基督教在中国的士大夫中扎下根，才可能使基督教深入中国人的心中。从广东肇庆到南昌、应天府（南京）、顺天府（北京）等地，利玛窦广泛结交中国各界人士，从朝廷大臣到布衣庶民，当时的中国名士几乎都与他相交，李贽、袁宏道、袁中道、徐光启、焦竑、章潢、李日华、李之藻等人更是经常与他讨论学术问题。利玛窦勤于著述，除了传教外，还把西方科学技术介绍给中国人。他在中国出版的《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等书，多数是采用各种形式与中国学者合作的，这使他声名大震。同时，他的《中国传教史》一书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其中关于中国社会与科学的详细而真实的描绘，使欧洲人看到了比较真实的中国，塑造了近代以来的东方观念。

利玛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西方多以基督教为国教，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却有孔子的学说，这种学说世代影响中国，包括皇帝的行为也要受到儒学的制约。他明确指出，孔子不是神，即儒学不是神学，但同时他又认为儒学是宗教，因为其作用与基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

^① [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003—005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